

民族工作資料月報

內部參考

10.10.12

合 刊

1955

西南民族學院研究室編

民族工作資料月報

一九五五年第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四輯合刊
(總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輯)

政治社會

關於從前落後的各族人民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馬·卡馬里
講師馬·朱努索夫 (一)

勝利前進的我國民族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薩基了 (九)

民族區域自治

甘孜藏族自治州五年來的變化 (康定報)

(一八)

鄂馬儂族侏儒族自治縣成立 (綜合稿)

(四〇)

法令

內蒙古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條例

(四四)

財政經濟

農業、畜牧業

開展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林鋼 (五五)

從一九五四年末農民家計調查資料看積極發展

我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必要性

在多民族地區也能夠發展農業合作社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胡昭衡（五九）

高峯（六四）

在民族雜居、居住極其分散的貧瘠高寒山區也能把社辦得更多更好

中共紫雲縣委書記 武守才（六七）

內地民族山區可以而且應當大量發展農業合作社 中共路南縣委書記 張志（七〇）

積極領導落後民族走合作化的道路 中共蘭坪縣委書記 李鑄宏（七五）

邊疆民族地區農業合作化問題 中共雲南省恩茅地委書記 張鈞（七九）

在雲南省邊疆地區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些體會 中共雲南省保山地委書記 鄭剛（八二）

移民開荒發展合作化運動，積極開發亞熱帶地區 中共保山縣委書記 王仁德（八六）

關於大苗山少數民族地區互助合作發展情況的報告 中共保山縣委書記 趙卓雲（九〇）

回族聚居地區發展合作化運動中的問題 中共巍山縣第三區區委書記 馬一駿（九六）

文山縣石洞鄉合作化運動中遇到的民族問題 中共文山縣委書記 劉振江（一〇〇）

根據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辦好民族聯合社（光明日報）（一〇四）

辦好各族農民聯合組成的合作社 中共甘肅省臨夏地委生產合作部部長 韓耀英（一〇六）

一鄉多社如何領導 中共甘肅省臨夏地委生產合作部副部長 單宗明（一〇九）

——魏戶鄉黨支部領導六個合作社的經驗介紹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疏附縣委書記 劉崗（一一四）

緊緊依靠少數民族幹部，大力開展合作化運動 中共南疆區委員會第三書記 祁果（一一六）

必須做好全面規劃工作 中共南疆區委員會秘書長 石金河（一二一）

色滿區六鄉全面規劃的具體做法和體會 吐魯番地湖鄉全面規劃工作的具體做法和經驗

石洞鄉進行全面生產規劃的情況與經驗 中共烏魯木齊地委工作組（一二八）

一個分散的山區農業生產合作社怎樣加強生產管理 中共雙柏縣委書記 章毅（一三六）

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展農業和畜牧業互助合作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 烏蘭夫（一三九）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牧業互助組……
陳旗試辦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初步體會

中共伊犁區委員會農村工作部（一四三）
阿拉坦（一四六）

文教衛生

語言文字

加強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光明日報社論）……………
努力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文字……………
（一四九）
（一五三）

教
育

辦好牧區民族教育的幾個問題
附：民族二年級教材

《且聽》一作資料索引一九五五年第十一、十二輯合刊（總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輯）

關於從前落後的各族人民向社會主義過渡

的問題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 馬·卡·馬里
講 師 馬·朱努索夫

蘇聯是一個各社會主義民族友愛相處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有著六十多個民族，他們的權利完全平等，彼此友愛合作。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蘇聯共產黨締造了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這種友誼，是蘇維埃制度強有力的永無窮盡的源泉之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各族人民兄弟般的友誼和合作——乃是蘇維埃多民族國家內各民族欣欣向榮的基礎。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想簡單扼要地敘述一下，蘇聯境內為數衆多的族，是怎樣在俄羅斯工人階級幫助下，消除了自己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並且越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種過渡的經驗，對於好多雖然處在新的特殊條件下但畢竟要走這條道路的國家和民族來說，具有很大的興趣和意義。

在十月革命以前，沙皇俄國經濟的發展是不平衡。幾乎全部工業都分佈在中央地區。俄國的亞洲部分，佔整個版圖的四分之三，但是那裏的工業企業的產品，在一九〇八年僅佔俄國全部工業產品的百分之三點五。在東部邊疆地區，有一些沒有來得及經過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族。這些族在中亞細亞有：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卡拉卡爾帕克各族；在北高加索有：卡巴丁、達吉斯坦部族、阿得蓋、契爾克斯各族；在西伯利亞有：布略特蒙古、哈卡斯、雅庫蒂、阿爾泰各族。這些族大約佔俄國人口的六分之一。他們

政 治 社 會

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手工業生產，比工業生產佔優勢。像中亞細亞這樣的邊疆，「一向被強制地充作中央地區所需求各種原料的供應地。」（「蘇共決議彙編」第一卷第五九頁）

東部邊疆各族人民主要是務農。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土地集中在當地剝削者手裏，這種情況在這裏並沒有導致以自由僱傭勞動力為基礎的大生產的發展。在農業方面，租佃關係頗為發達。農民使用的是原始的生產工具。在這些地區，資本主義前的關係，仍然佔統治地位。

若干族過着游牧、半游牧的生活，他們從事養畜業，他們的經濟主要是自然經濟的性質。游牧的各族人民還保留着宗法、氏族的生活樣式。沙皇政府極力維護這些地區的落後的社會關係。

東部邊疆各族儘管在經濟和文化上是落後的，但由於同俄羅斯無產階級處在一個國家裏，所以也逐漸地捲入了全俄的革命運動。帶有民族解放運動性質的當地居民的革命發動，成了俄國革命洪流中的一個支流。被壓迫的俄國各族人民，祇是在俄羅斯工人階級的領導下，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獲得了民族自由。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消滅了一切陳腐的、反動的東西，把各民族的勞動者團結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之下。

社會主義革命一舉推毀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沉重枷鎖，給俄國各族人民帶來了真正的自由。這一革命為各族人民實行自願的友愛合作創造了條件。

社會主義革命為落後的各族人民渡過痛苦的資本主義階段，從資本主義前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開闢了前途。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逐步消除俄國邊疆各族人民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大家知道，東部邊疆各族人民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水平竟如此之低，以致起初連社會主義革命帶給他們的那些偉大權利都不能充分享受。社會主義革命曾經宣布了各族人民完全自由和平等。在消滅民族壓迫之後，民族問題並沒有從日程上撤消。民族問題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最複雜的問題之一繼續存在。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下，民族問題必須用新的觀點來觀察，用新的方式來解決。

正如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所指出的，任務就在於要用各族人民在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的平等來補充他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保證各族人民事實上的平等，是共產黨民族政策中的根本問題，是使落後的各族人民從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需條件。

對於在經濟和文化發展中落後的各族人民，需要實行特殊的措施，來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事業。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報告中指出：「俄國共產黨人在從前屬於沙皇政府的殖民地裏，在土爾克斯坦

等這類落後的國家裏所做的實際工作，給我們出一個問題，即如何在處於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下運用共產主義的策略和政策……」（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一七——一八頁）這是一項繁重而複雜的任務。必須使東方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專政機關適應為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封建殘餘而鬥爭的任務，必須使這一機關為提高勞動人民的階級覺悟、消除當地剝削者對羣衆的影響而努力工作。

二

蘇聯的經驗證明，在多民族的國家裏，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在其活動中注意從前被壓迫各族人民在經濟制度、階級構成、生活上和文化上的特點，只有國家政權機關使用當地居民的語言行使職權時，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才能得到鞏固。

在從前資本主義的關係佔統治地位的民族地區裏，蘇維埃是在消滅經濟中的封建殘餘和克服宗法、氏族生活樣式的進程中，是在提高居民文化水平和發展當地人民的知識分子的進程中得到鞏固的。在多民族的國家裏，創立和鞏固從前被壓迫各族人民的民族的國家制度，是鞏固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的最可靠的手段。

非俄羅斯民族幾乎佔了俄國整個人口的一半。爲了發展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的蘇維埃國家制度，必須實行蘇維埃自治，在國家管理中使用當地居民的語言。

在實行自治以前，對各民族地區居民的民族成分進行了一番巨大的研究工作。好些邊疆民族區的居民幾乎個個都是文盲；好多族甚至都沒有文字；沒有能够幫助蘇維埃政權掃除文盲和培養當地幹部的民族知識分子。因此，民族自治是隨着給當地政權機關培養忠於蘇維埃制度的幹部這一工作的進展而開展起來的。比如，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土爾克斯坦蘇維埃共和國，包括現在的中亞細亞幾個共和國的領土，即：烏茲別克共和國、塔吉克共和國、土庫曼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的一部。

由於當地居民出身的民族幹部的增多，以及政權機關接近居民的需要，後來就在土爾克斯坦共和國的基礎上

成立了一系列新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蘇聯共產黨在為創立從前被壓迫各族人民的蘇維埃國家制度而鬥爭時，考慮到他們想擁有為他們所親近和瞭解的政權機關的極殷切的願望。共產黨善於靈活運用的各種自治形式（民族區、自治州、自治共和國和加盟共和國），激發了大小各族人民的創造性和建設性的力量，團結了他們來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共同努力。

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目的在於鞏固蘇維埃在當地居民中的威信，逐步地使剝削者在勞動羣衆中間孤立起來。這種政策和策略的特點，就在於政權機關「對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農民，更加緩和，更加謹慎，更加讓步」（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二九六頁）。首先，是在稅收政策、信貸等方面遵循了列寧的這個指示。勞動農民根據切身的經驗逐漸地確信，他們從國家得到信貸比向當地剝削者借債有利得多。

共產黨對待所謂「回教法庭」的態度，可以當作說明共產黨為了在落後各族人民中鞏固蘇維埃政權而照顧居民覺悟程度的一個例子。「回教法庭」是以宗教道德的規範為指導的。在這裏，兩個婦女的證詞才能頂得上一個男人的證詞。由當地剝削者把持的「回教法庭」，是鞏固舊道德及宗法生活樣式的手段。企業刻不容緩地、立刻取締「回教法庭」，就會把武器交給當地剝削者手裏，便於他們從事欺騙人民的勾當。他們就可能別有用心地扮演起維護「民族習尚」的角色。

因此，蘇維埃政權指出，如果居民願意保存「回教法庭」，就讓他們保存好了。並且規定，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找「回教法庭」和蘇維埃法庭。

為了使蘇維埃法庭接近當地居民，曾經實行了用民族語言履行訴訟手續的作法。並且制定了一項懲罰因固守民族生活殘餘（例如因血的復仇而引起的兇殺、多妻制、討財禮、早婚等等）而犯的罪行的法令。

在殘酷的鬥爭過程中，剝削階級的陣地不斷削弱，他們對勞動人民的影響不斷減低，而蘇維埃機關的威信却不斷地在增長。勞動人民越來越多地去找蘇維埃法庭了。「回教法庭」的活動很快就受到了限制，過了一些時候，它們就完全吃不開了。

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在發展蘇聯為數衆多的各族人民的國家生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了一批強大的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產生了一批社會主義的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民族區。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原則，是蘇聯各族人民進行國家建設的最高原則。蘇維埃制度給蘇聯各族人民（無論是大族和小族）開闢了走向經濟和文化真正繁榮的道路。

三

正如上面所說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好些民族地區遇到了資本主義前的社會關係。只有在消滅經濟中宗法封建殘餘的基礎上，才能把吸引落後各族人民參加新生活建設的事業推向前进。蘇聯共產黨在東部邊疆區進行消滅剝削者的鬥爭時，會照顧到勞動羣衆的覺悟程度，以及他們擁護蘇維埃政權的初期，在國內戰爭時期就已被消滅了。但大家知道，在俄羅斯中央地區，地主和大資本家早在蘇維埃政權的初期，在國內戰爭時期就已被消滅了。但是要在東部邊疆區消滅地主經濟，則需要一定的時間。在實行土地和水源改革以前，中亞細亞的農民每年向當地地主繳納的地租，約計二千五百萬到二千八百萬盧布。

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蘇維埃政權在中亞細亞各共和國實行了土地和水源改革，這次改革的任務是要消滅經濟中的封建制殘餘。在實行這一改革時也照顧了各地區的特點。比如，費爾干州和塔什干州的商品關係比蘇爾汗達里亞州和花拉子模州發達得多，所以這裏的土地和水源改革實行得比較早（是在一九二五年），而其它各州，則是在一九二八年實行的。農民分得了土地、農具，嚐到了革命的果實。這就促使俄羅斯無產階級同從前落後各族農民的聯盟進一步鞏固了起來。

農村裏封 關係殘餘的消滅，促進了農業的高漲。

在游牧地區用革命的辦法摧毁封建制殘餘，要困難得多。這裏，當地的剝削者對勞動羣衆的影響相當大。他們在保存氏族公社土地使用制的掩護下，霸佔了最好的牧場，剝削勞動羣衆。一九二六年，在哈薩克斯坦從剝削者手裏沒收的草地約計一百四十萬公頃，沒收的牧場達一百二十萬公頃。大牲畜所有主擁有的牲畜在游牧區達四百多頭，在半游牧區達三百多頭，在定居區達一百五十多頭，他們的牲畜被沒收後都分給了雇農和貧農。

個別的大牲畜所有主，利用宗法關係的殘餘，有意識地挑起各山村牧民之間的敵意，並且依仗他們對勞動羣衆的影響，來阻礙山村的蘇維埃化，並且通過行政手段遷出共和國和州境以外。

無論在游牧區或定居區摧毁封建制殘餘，都導致了經濟中小商品經濟結構的加強。小商品經濟結構也是靠宗法制度的解體和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而增長起來的。小生產者農民經過合作化的各種形式，逐步納入了社會主義發展的軌道。

發展民族地區的工業對於吸引落後的各族人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分

佈（工業生產接近原料產地和消費地區），使得蘇聯的各州、各共和國（包括民族區在內）有可能促進工業的發

展。在蘇聯工業以高速度發展的條件下，東方各民族共和國的工業也發展得特別快。比如，拿一九四〇年大工業的總產量同一九二三年比較，整個蘇聯幾乎增為十二倍，而哈薩克共和國却增為二十倍，吉爾吉斯共和國增為一百五十三倍，塔吉克共和國增為三百零八倍。

在民族地區的工業分佈中，不僅考慮到經濟的因素，而且考慮到政治的因素。大家知道，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社會力量，是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不僅是民族內部的聯盟，而且是民族間的聯盟，國際的聯盟。事實上也是這樣，俄羅斯工人階級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中，以它同從前被壓迫和落後的各族農民的聯盟，補充和擴大了它同俄羅斯農民的聯盟。實踐證明，當邊疆民族區形成了當地的工人階級時，這一聯盟才更加鞏固了。當地的工人階級，按斯大林的說法，乃是聯結俄羅斯工人和民族區勞動農民之間的一座橋梁。

各民族共和國和州內的工業，是在最大限度地吸引當地居民參加工業生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比如，哈薩克斯坦在八年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工人總數增為六點七倍，其中哈薩克人出身的工人則增為三十一倍。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全國共同的事業，蘇聯境內的各族人民，都按照自己的能力（礦產、動力及勞動等資源情況），來實現這項歷史性的任務。

農業的集體化對於落後的各族人民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各民族友愛合作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落後的各族人民，可以利用工業發達的民族所創造的那種物質技術前提，來實現農業的集體化。蘇聯的經驗、蘇聯共產黨的經驗，都說明了這一點。

蘇維埃東方各共和國的農業集體化有好些特點。在這些地區，不僅需要消滅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關係，而且需要消滅仍然保留着的宗法封建制的因素。這一情況不能不給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業中的勝利增加許多困難。因此，東部民族地區集體農莊的發展速度，比農業發達的地區慢得多。在這裏，廣泛流行的是一級形式的集體經濟，即土地共耕社。在楓北地區的小部族當中，土地共耕社直到三十年代的末期才轉為農業勞動組合。

在農業集體化的進程中，完成了游牧、半游牧居民在一定地域上的定居。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轉為定居生活方式的勞動羣衆給了很大的幫助。國家撥給他們貸款、建築材料等等。

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保證了蘇聯各族人民全面的經濟繁榮；現代工業和巨大社會主義農業的

建立，保證了蘇聯各族人民實現事實上的平等，保證了落後的各族人民從資本主義前的關係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

四

蘇聯的經驗證明，發展從前被壓迫各族的民族文化，克服他們在文化上的落後，就會便於和加快使這些族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只有用當地居民的語文大量出版報紙、雜誌、圖書，只有在學校裏使用本族語言授課，以及在國家機關裏用本族語言辦公，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共產黨的政策，才是從前落後的各族人民最能理解和最感到親切的。為了實現這一任務，就必須給沒有文字的各族創造文字。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裏，在俄羅斯學者的積極幫助下，已經給蘇聯的四十八個族制定了文字。

在全國實行文化革命的進程中，蘇聯共產黨保證了民族地區文化建設的加速發展。一九四〇年全蘇聯小學和中學的學生人數比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學年度平均增為四倍。在這一段時間裏，哈薩克共和國的學生數增為十點九倍；土庫曼共和國增為三十五倍；吉爾吉斯共和國增為四十七倍；烏茲別克共和國增為七十三倍；塔吉克共和國增為八百二十二倍。這樣算來，哈薩克共和國的國民教育發展速度比全蘇聯發展的平均速度快二點七倍；土庫曼共和國快八點七倍；吉爾吉斯共和國快十一點七倍；塔吉克共和國快二百零五點五倍。文化建設的這種高速度，保證在大約二十年的時間裏，消滅了蘇維埃東方各族人民數世紀以來的文化落後狀態。

共產黨在各共和國和各州內，培養了人數衆多的蘇維埃知識分子幹部。這是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黨從當地人中間培養出一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幹部，他們能够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並能帶領廣大人民羣衆沿着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前進。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就不能在落後的各族人民中間實現革命的改造。當地人出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幹部，用斯大林的話來說，就是「蘇維埃政權在各邊疆的最重要的，而歸根到底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堡壘」。（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四頁）

在民族地區培養馬克思列寧主義幹部所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就是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來反對從前被壓迫各族人民俄羅斯民族的友誼。因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就企圖使這些族喪失消滅經濟和文化落後的可能性，以及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可能性。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鬥爭和粉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是吸引從前落後的各族人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鞏固他們同偉大俄羅斯民族及蘇聯其他各族人民的友誼所必需的條件之一。

蘇聯各族人民的經濟的蓬勃增長、國家制度的發展、文化的繁榮，都是同偉大俄羅斯民族給予從前各被壓迫民族的那種巨大而經常的援助分不開的。俄羅斯民族忠誠地履行了列寧關於必須給落後的各族以全面援助的遺教，以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起的領導作用博得了蘇聯各平等民族的領導力量的榮譽。蘇維埃國家各族人民，爲了感念俄羅斯民族的英雄行爲，一致把它稱作自己的老大哥。

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只要政權掌握在由偉大共產黨領導的勞動人民手裏時，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能够在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讓我們拿五個蘇維埃共和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同相隣的四個東方國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來作一番比較。總共不過三十七年以前，蘇聯的這幾個國家同相鄰的那幾個東方國家在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上幾乎處在同樣的水平。但是現在却根本不同了。擁有一千七百萬人口的蘇聯境內的五個東方國家，在一九五三年生產的電力，比擁有一億三千萬人口的四個相鄰的東方國家多三倍半。

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中亞細亞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單拿高等學校學生的人數在各共和國居民人口中的比例來看：阿塞拜疆共和國每一百零七人有一個大學生；烏茲別克共和國每一百四十二人有一個大學生；吉爾吉斯共和國每一百五十六人有一個大學生；土庫曼共和國每一百六十六人有一個大學生；塔吉克共和國每一百八十八人有一個大學生。同時，伊朗是每三千三百人才有一個大學生；土耳其和埃及是每八百八十三個人才有一個大學生；英國是每五百九十一人才有一個大學生。由此可見，中亞細亞的蘇維埃各族人民所達到的高等教育的水平，不僅趕過了附屬國和半殖民地國家，而且還趕過了像英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帝國主義強國。

所以能達到這樣的成果，是因爲有蘇維埃的社會制度，是因爲有十分關懷蘇聯各族人民在文化上進步的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裏，廣泛地幫助和支持從前被壓迫的落後的各族人民發展文化。只有在各族人民全面合作的基礎上，在他們完全平權、互助（包括先進的社會主義民族對從前被壓迫的落後各族人民的幫助）的基礎上，這些族才能越過痛苦的資本主義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才能消除各民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保證一切民族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有最快的進步，保證他們一往直前地向社會主義前進。

主義的直接過渡。他們的經驗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在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面前，開闢了越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前景。一九一九年，列寧向東方各國的共產黨人指出：「如果俄國布爾什維克已把舊的帝國主義打破了一個缺口，自己担负起了一個非常困難然而又非常崇高的創造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務，那末在你們東方勞動羣衆的代表們面前就擺着一個更偉大和更新的任務。」（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一三七—三八頁）

列寧和斯大林曾號召東方各國的共產黨人，要在革命地改造社會生活中，創造性地、巧妙地運用一般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中國共產黨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創造性地運用列寧主義關於從前落後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理論的光榮隊伍之一。中國共產黨人英明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發展的非常豐富的實踐結合起來，卓有成效地領導各族人民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勝利前進的我國民族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薩空了

一、區域自治是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

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蘇聯共產黨三十多年來解決民族問題的豐富經驗，結合中國民族問題的實際，提出了在過渡時期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總任務：「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共同來建設祖國的大家庭；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保障各民族一切權利方面的平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祖國的共同事業的發展中，與祖國的建設密切配合起來，逐步地發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其中包括穩步的和必要的社會改革在內），逐步地消滅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使落後的民族得以躋於先進民族的行列，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任務的基本精神，一九四九年即規定在中國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裏面，在去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憲法裏，比共同綱領作了更進一步的規定。

（十月五日人民日報）

黨實現上述任務的基本政策，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依據蘇聯的先進經驗，針對着中國民族的具體情況幾年來的經驗，充分證明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優越性。

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優越性首先在於它體現了各民族一律平等，鞏固了祖國的統一，加強了民族團結。依照憲法的規定，我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都實行區域自治。各級民族自治機關不只是行使一般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且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地方的財政，依照國家的軍事制度，組織本地方的公安部隊；依照本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機關都必須逐步的民族化，即自治機關應以當地民族人員為主要組成成分，自治機關形式應依照當地民族大多數人民的意願決定，自治機關執行職權時要使用當地的民族通用語言文字。這些規定使我國各民族人民深刻的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度下才能這樣徹底地改變少數民族人民過去多少年來受歧視、受壓迫的地位，真正享受到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當家作主的權利，並進一步的認識到祖國各民族人民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完全一致的利害關係，只有在各民族親密團結的基礎上，各民族人民的權利才有保障。憲法上規定的「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把黨將各民族人民從被奴役、壓迫的地位解放出來後，才得實現的「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也就是保證各民族人民已享受到的平等權利永遠鞏固。

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優越性還在於它保證了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能以得到不斷發展，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依照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的規定，民族自治區是在各民族聚居的地區，依據當地的民族關係、經濟發展條件，並參照歷史情況來建立的。自治區的民族組成和區域界線等，也是根據上述各種條件來確定的。並規定各民族自治區的自治機關，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的一級地方政權，接受上級人民政府的領導。這樣民族自治區的建立就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並能夠經常取得上級國家機關的領導和幫助，使不同發展階段的、聚居的各民族都能根據以上原則來建立本民族的自治區，使他們依據當地的需要與可能，在國家經濟計劃的統一規劃之下，在中央、上級人民政府的幫助下，逐步地改變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向着社會主義的幸福前進。

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所以具有這些優越性，是因為它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又深入的結合了我國民族的具體情況。在近年來的實踐中，完全證明了它確實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鑰匙。使用這把鑰匙，一定可以幫助全國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各民族人民穩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貫徹完成在過渡

二、幾年來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成就

幾年來，在全國各個民族聚居地方正確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從去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到現在，新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有七個。全國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共有一百三十三個；其中自治區、自治州二十八個，自治縣四十五個。最早建立的內蒙古自治區已有八年多的歷史，最近建立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正在籌備建立中的有西藏自治區。

這些自治地方的建立，充分證明了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正確性。各民族聚居地區，都是依據當地的各項具體情況來建立的。例如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的過程就完全不相同，內蒙古自治區是先建立了蒙古民族的自治區之後，才逐步在區內其他人口少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建立以下的各級自治地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却是在區內各個人口少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先分別建立了自治州、自治縣之後才最後建立起來的。再如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劃，會因行政區劃的變動，經過了四次變動和發展，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建立，即劃定了區域界線。這些不同都是依據當地不同的民族關係、經濟發展條件和歷史情況來決定的，因而完全適合當地各聚居少數民族的要求。

西藏地區由和平解放到今年九月二十日成立了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處的過程中，更是正確體現了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正確性與靈活性。它促使藏族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圓滿促成了民族內部的親密團結，為西藏地方的建設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這些民族自治地方建立之後，在自治機關民族化方面也都是有進展的。在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大力培養了各民族自治區的民族幹部，各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發展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內蒙古自治區已有蒙古民族和其他各少數民族的幹部三萬多人，自治區內的各級黨和政權機關中蒙古民族已佔主要成分；蒙文已成為行使職權的主要工具。在其他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幹部的成長也是很快速的，如以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為例，更可以看出自治機關民族化的進度，是非常迅速的。當一九五二年，自治州建立以前，民族幹部只佔當地幹部總數百分之一五，現在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八，兩年多時間就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三。

扼要的說，從已建立的七十三個民族自治地方的經驗來看，民族區域自治實行後，普遍的提高了各民族人民

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參與國家建設事業的積極性，加強了各民族之間和各民族內部的團結，密切了自治機關同人民之間的聯繫，逐漸促進了各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跟隨着而來的，必然是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日益鞏固，生產建設、文化教育事業的更加發展和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不斷改善，為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鋪平了道路。

三、少數民族地區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

從全國各少數民族地區幾年來各方面實際發展的情況來看，更足以證明黨的民族政策的正確性。光輝的黨的民族政策，鼓舞了各族人民向社會主義前進的信心。以下，就最近全國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情況作些簡要的介紹。

(一) 少數民族地區的農牧業有了新的發展。糧食產量和各種技術作物的生產量都普遍地提高了。據內蒙古自治區、桂西僮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三個地區的統計，一九五四年的糧食產量較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十一點五。其他少數民族地區農業一般的也都有了發展和提高。

這發展是和黨、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的農業生產的幫助分不開的。針對着各地農業的不同情況，黨和人民政府會採取了擴大耕地面積、興修水利、改良農具和農作法、發放農業貸款等一系列的措施，對生產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在有條件的地方，擴大耕地面積，已證明是若干提高農業生產的有效措施中的一種。如：內蒙古自治區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擴大了耕地七十三萬多畝；桂西僮族自治區最近兩年內擴大了耕地八十多萬畝，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幾年來開墾了荒地八萬畝。在可能興修農田水利的地方就興修水利。如：僅就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青海省三個地區統計，去年中央直接撥發的水利投資，就實際完成了三百七十多萬元，由國家投資或領導羣衆興修的大小水利工程可以擴大和改善農田灌溉面積二百多萬畝。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水利工作，也都有很大發展。在需要改良農具農作方法的地方，就在這些方面來進行幫助。從發展少數民族農業生產來說，這類幫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為了改變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缺少鐵質農具的狀況，在去年、前年兩年，西南各省發放無償鐵質農具，共值七百八十八萬元。此外各少數民族地區都在逐步推廣各種新式農具，受到了少數民族農民的歡迎。還有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國營農場、示範農場和技術推廣站，對於推廣並指導少數民族農民使用新式農具和

學會新的農作法，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少數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不僅和國家的物質幫助分不開，而且也是和黨、人民政府依照不同的情況進行政策領導，幫助各族人民提高覺悟，以及各族人民的自覺努力分不開的。許多少數民族地區農業增產，是由於開展了互助合作運動。全國現約有兩千五百萬人口的少數民族農業區，先後完成了土地改革，近一年來這些地區開展了互助合作運動，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截至去年底，桂西僮族自治區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二千六百六十多個，互助組十五萬個，組織起來的農戶，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湘西苗族自治州組織起來的農戶亦已佔總農戶的百分之五十五；到今年三月，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二千三百多個，有百分之五十的農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起來的農戶已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八十六點二；雲南、貴州兩省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三千七百三十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一千九百三十多個是少數民族農民和漢族農民或是幾個少數民族的農民共同建立的。全國各地回民聚居或回民與別的民族雜居的地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也有很大發展，根據甘肅、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部分地區不完全的統計，已有回民組成的和回民同其他民族共同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千三百五十多個。許多地方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發展很快，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去年底有農業生產合作社四百八十多個，到今年春耕前，已發展到一千六百九十個，內蒙古自治區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今年春耕前，已由去年底的三千六百十七個發展為六千八百多個。

少數民族地區的畜牧業生產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內蒙古、新疆和青海各種大牲畜現在已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強；小牲畜去年即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其他少數民族牧區的牲畜頭數，也都有增加。這發展也是和黨、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的畜牧業的大力扶持分不開的。例如：去冬今春，內蒙古有些地方和青海果洛和新疆北部牧區的風雪災害很嚴重，中央即派了大批車輛解決飼料運輸問題，並派飛機空投糧食飼料十萬多斤，使受災地區的人、畜，得到及時的救濟。這發展也是和黨、人民政府的政策領導，幫助各族人民提高覺悟以及各族人民的自覺努力分不開的。

在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的牧業區，目前互助合作運動正在穩步地前進。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近一、二年來，在牧業區，不僅互助組的數量增加了，而且質量也在逐漸提高，許多臨時性的互助組發展為常年互助組。幾年來，內蒙和新疆試辦了幾個牧業生產合作社，還試辦了一些農牧結合的生產合作社，國家在牧區還舉辦了國營牧場，這是牧區的社會主義經濟，正在力求辦好並將適當加以發展。由於牧區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必